

第20卷
第2期

20周年纪念
1997—2017

马克思主义 美学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中国知网入选期刊

主 编 ◎ 王 杰

名誉主编	刘纲纪
主 编	王 杰
副 主 编	夏锦乾
	冯仲平
编辑部主任	尹庆红
编辑部副主任	于 琦
	王 真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20卷. 第2期 / 王杰主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4
ISBN 978-7-5473-1274-2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619 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0卷第2期)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70 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74-2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 52069798

编 委 (第二届)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托尼·本尼特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阿里夫·德里克

美国芝加哥大学

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

特里·伊格尔顿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

冯宪光

四川大学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亚敏

华中师范大学

王建刚

浙江大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美国杜克大学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林宝全

广西师范大学

刘纲纪

武汉大学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

陆贵山

中国人民大学

贾斯汀·奥康诺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亚历山大·彼得罗夫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邱格屏

华东政法大学

迈克·桑德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王 杰

浙江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沃尔夫冈·韦尔施

德国耶拿席勒大学

徐 岱

浙江大学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政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朱立元

复旦大学

〔德〕海科·费尔德纳 〔意〕法比奥·维吉*

〔卡迪夫大学现代语言学院〕

许妍娜 黄漫 译

资本主义的有限性及对此的倒错性否认^{*}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和发展了雅克·拉康的“资本主义话语”，将它与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以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本文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与拉康的观点，主张必须与危机的症状性特征建立联系，而不是倒错地迷信资本主义具有永恒自我更新的能力。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的教学当中，拉康力图解决一直沉寂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问题，他提出价值——这种根植于人类劳动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源于无意识，换句话说，源于工人本身内在固有的创造性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已经被无意识所指所过度决定。在拉康看来，资本主义的抽象给自己设定了历史任务，那就是将人类知识的无意识实质转换为看起来可计算、可量化的价值以便交换并从中获利，以废除人类知识的无意识实质。对这一困境的分析使我们在探讨当前危机时能够注意到，资本通过剥削人类劳动产生利润的能力正在消失，当前的危机与这种能力的消失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有关。本文对与今天的绿色资本主义的“创新悖论”相关的这一困境加以探讨，并提出以下观点：与相信新一轮的科技攻势所具有的变革能力相对应的是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否认。

【关键词】危机；价值形式；马克思；拉康；绿色资本主义；否认

雅克·拉康与卡尔·马克思不是、也不会轻易成为盟友。但是，尽管他们倾注

* 〔德〕海科·费尔德纳(Heiko Feldner)，英国卡迪夫大学现代语言学院德国研究与批评理论教授，“意识形态批判与齐泽克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研究员。〔意〕法比奥·维吉(Fabio Vighi)，英国卡迪夫大学现代语言学院意大利研究与批评理论教授，“意识形态批判与齐泽克研究中心”主任。两人合作的著作主要有：Žižek: *Beyond Foucault* (2009),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15)等。

* 本译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00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毕生精力研究人类生存状况的不同的看似不相关的方面,却同样对现代性危机有着深切的关注:德国哲学家马克思批判地剖析了资本的话语以揭示其内在矛盾,而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则日益专注于阐释为当代的后形而上学主体提供支持的话语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当然不是在鼓吹要将两位思想家强行结合起来,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同样执着于社会的结构性断裂并将其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在本文中,我们将探究拉康对资本主义以及科学话语的质疑,以佐证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对当前危机所做的分析,尤其是对绿色资本主义的创新悖论的分析。我们同时吸收马克思与拉康的观点,主张必须与危机的症状性特征建立联系,而不是倒错地迷信资本主义具有永恒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消说,拉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能够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及这种生产模式如何依赖于价值形式的深刻见解所产生的一些最重要的影响加以充分考虑。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提出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话语将彻底改变他之前所设想的四种固定话语(主人话语、癔症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家话语)的旋转逻辑。拉康话语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为了掌握社会形态本身的一种否定的实质(a negative substantiality)——通常称之为“真实界”(the Real)——的运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拉康开始把他的话语建构为辩证的结构,在该结构中,社会的总体性与由“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无意识所体现的破坏的否定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特定的关系,此时他的目的变得越发明显。这实际上是关乎如何处理一种最根本的困境、一个随时可能引发话语自身内爆的矛盾的问题。简单地讲,对拉康而言,历史是一个战场,战争的一方是来自话语专属领地(即象征界的领地)的各种力量,另一方是产生这些力量的源头所特有的偶然性(即真实界)。当然了,这里不会有任何获胜者,因为象征界与真实界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隐匿于人类内心深处最阴险的幻想也许正与想要废除这两者之一的冲动有关。

紧接着我们将着重指出马克思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到这一拉康式的战场——在这里象征化的努力遭受来自真实界的攻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试图对当前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做出新的阐述。价值,作为一种“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①起源于对抗,资本的批判始于对这个事实的承认。马克思充分有力地阐释了价值问题,但他尽管窥见到这一对抗却未能将其置于思考的中心。而拉康,尤其是在第十六期研讨班(《从大他者到小他者》,1968—1969)与第十七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另一面》,1969—1970)中,解决了一直沉寂的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前提

^①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8.

问题。也就是说,拉康展示了价值,作为一种根植于人类劳动价值化过程(valorisation)^①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如何被理解为无意识的劳动。拉康接受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挑战,为其补充了一个重要发现:被马克思视为资本之实质的人类劳动与一种“无法认识自身的知识”(即无意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讲就是关于如何从工人阶级那里掠夺这种知识。换言之,资本主义话语所执行的总体性抽象为自己所设定的历史任务就是:将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界转换为看起来可计算、量化的价值以便交换并从中获利,通过这种做法将这个总是带来麻烦的真实界废除掉。然而,正如拉康所强调的,尽管资本主义诡计多端,但其寿命可能比我们合理推断的还要短。拉康在1972年的米兰讲话中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的话语“非常精明,但注定要破灭”^②。它骗不了拉康,因为拉康识破了在不断加剧的资本主义扩张模式中经济价值化(economic valorisation)的特定功能。但它为什么会内爆呢?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也就是从更大的历史话语,即与资本主义的运作唇齿相依的现代科学知识话语开始说起。

一、一切从科学的驱力开始

根据拉康的观点,随着主人话语向他所谓的大学话语转变,现代科学产生了。在大学话语中,主人能指(负责象征有效性的支配性能指)被推至无意识真理的位置,正是从这里开始,S1(主人能指)持续运作起来。这意味着激发了现代科学的正是一种“认识论的驱力”,它通过累积那些最终总是揭示出自身的不充分因而无法满足潜在的“认知欲望”的知识而获得一种悖谬的满足。由于这个原因,科学(正如资本主义一样)注定不会具有人性的一面,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想赋予它伦理的维度。拉康的大学话语论及现代科学的双重维度,即其认识论的正面与反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科学属于快感(jouissance)的真实界(即作为一种有规律搏动的无意识驱力);另一方面,它将科学的历史变革当成非个人的、中立的、客观的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胜利,拉康巧妙地指出这种知识与学术界中交换的知识是同一类的。^③ 因此科学变革的“认识论转向”与对S1的结构性排斥相关,这种排斥作为驱

^① 马克思所提出的概念 *verwertung*, 在英语世界曾经被译为“realisation of capital”、“creation of surplus-value”、“self-expansion of capital”、“increase in value”等,今天大多译为“valorization”,如企鹅出版社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价值化,二是价值增殖。本文根据具体表达翻译。——译注

^② Jacques Lacan, *Lacan in Italia/Lacan en Italie 1953-1978*, Milan: La Salamandra, 1978, p.48,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ck W. Stone, web.missouri.edu/~stonej/Milan_Discourse2.pdf,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6.

^③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VII,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Russell Grigg,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7, pp.197-208.

力开始运作。下图显示的是主人话语向大学话语的转变：

$$\begin{array}{c} \text{主人话语} \\ \frac{S_1}{s} \rightarrow \frac{S_2}{a} \end{array}$$

$$\begin{array}{c} \text{大学话语} \\ \frac{S_2}{S_1} \rightarrow \frac{a}{s} \end{array}$$

此处,我们所得到的拉康式论点是:在17世纪随着新的科学话语而出现的真实界只有紧紧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融入一个社会环节并再生产其自身,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通过将人类劳动的真实界系统地转换为价值——最终则是剩余价值——来运作的。换个方式讲,资本主义尝试为现代科学内在的创伤性驱力提供某种程度的话语的平衡,从而占据了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与激活欲望的形而上学相一致,它们都取决于拜物(恋物)的诡计——从人类劳动的商品化开始,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商品化。从那一刻开始,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metabolic interaction)^{①②}的意义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因为新的科学范式所引发的名副其实的“海啸”在名为资本主义的“俗世崇拜”中寻求它自身的价值中介。^③

对拉康而言,现代科学既是实证主义的又是被驱动的。在处理科学的实证层面时,拉康与普遍的做法一致,对现代理性认识论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将这种批判应用于“劳动价值化”的资本主义定律,这是其方法的新颖之处。而在面对科学的无意识维度时,拉康所支持的是一种不仅不规避反而充分假定真实界矛盾本质的认识论,它使得科学对任何意识形态的占用或系统化漠不关心。明显地,对科学的这第二种理解——拉康将其与自己的精神分析事业联系了起来(譬如在“有固定体系的结构”[formalised structures]的用法中)——是“对弗洛伊德的回归”,因为它正是建立在真实界(或者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无法抹除的矛盾性基础上。我们因此可以推断,科学客观性的话语(即大学话语)所具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出卖了与它的驱力认识论相关的即便不是保守的也是防御性的功能;它作为一种内在幻想起作用,试图掩盖伴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而出现的作为对真实界的干预的赤裸裸的驱力。

在研讨班的各个部分中,拉康都谈到了科学变革的创伤性本质,譬如在讨论艾萨克·牛顿身上的神秘论悖论时。一方面,牛顿做到了“将任何神性的阴影……从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p.283 & pp.637-638.

② 马克思用 *stoffwechsel* (英译为: metabolism 或 metabolic interaction) 一词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内译为“物质变换”、“物质交换”或“物质循环”等。如:“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译注

③ 参见: Walter Benjamin, “Capitalism as Religion”, in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Eds.),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88-291.

天堂中坚决驱逐”^①；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各种宗教文本中搜索，希望阐明神创论的奥秘，正如拉康在第十六期研讨班中所言：“牛顿也一样，他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他创作了一本巨著……它评论了世界末日论和丹尼尔的预言。”^②在第十二期研讨班中，拉康也说过：“对于他（牛顿）来说，重力作用似乎并不能由其他任何东西所支持，除了这位纯粹的、至高无上的主体，理想主体的这种升华，而这就是牛顿的上帝。”^③这种在宗教文本中寻求庇护的行为充分说明了科学话语在寻找其自身纷乱的驱动力时^④从一开始就遇到的困难。

如果说牛顿的著名方法论原则“我不做假设”^⑤（我不装作有假设，也就是说，我只依靠公式，它们只描绘现象而不寻找原因）可以被看作将科学的能指带到真实界层面的“认识论缺口”，那么拉康则指出这种转变只有在（或多或少无声地）假设/预设了他者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⑥简言之，对拉康而言，科学在“神学的包裹”中迈出最初的步伐，依靠一个先验的机制（由他者所维持的客观性）试图确保社会象征秩序的连续性。^⑦这样一来，出现下面这个情况也许就不显得偶然了：当爱因斯坦被问及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时，他的回答是“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这句话成为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在新的科学范式中，上帝—保证者（如笛卡儿所言）的角色几乎立刻被废弃，心理分析的主体宣称自己是科学“内部的外在者”（internally external）。它属于同一范式，但是它赖以运作的假设恰恰是被科学所否定的那一个，即无意识主体的存在，正如语言的运用所证明了的。如拉康所说：“正因为无意识的存在……能指才能被召唤来构成符号。”^⑧如我们将看到的，拉康针对资本主义话语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批评关注的正是无意识这个缺失的原因的扭曲——一种名为价值化的扭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拜物教的替代品，建立起抽象劳动的新体制。

① Jacques Lacan, *Seminar XII, Crucial Problems for Psychoanalysis*, 1964–1965, lesson of 12 May 1965. (尚未有英文版本出版，本文中所有英文翻译均为本文所有)。

② Jacques Lacan, *Seminar XVI, From an Other to the Other*, 1968–1969, lesson of 12 February 1969. (尚未有英文版本出版，本文中所有英文翻译均为本文所有)。

③ Jacques Lacan, *Seminar XII, Crucial Problems for Psychoanalysis*, 1964–1965, lesson of 12 May 1965. (尚未有英文版本出版，本文中所有英文翻译均为本文所有)。

④ 在第十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提出，尽管笛卡儿与牛顿进行了革命，但孔德的实证主义仍然坚持“一种将地球视为伟大的物神的宗教原理”。参见：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8, p.152。

⑤ “Hypotheses non fingo”，拉丁文，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名言。——译注

⑥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8, pp.141–142.

⑦ Jacques Lacan, *Seminar XVI, From an Other to the Other*, 1968–1969, lesson of 30 April 1969. (尚未有英文版本出版，本文中所有英文翻译均为本文所有)。

⑧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8, p.142.

二、排除机制与资本主义话语

拉康提出,现代科学往往对精神分析的主体加以缝合,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认知与存在相符合”^①(即理智与事物一致)的理性活动。这种试图移除无意识主体的重大尝试产生了结构上的影响。首先,通过这种方式科学阻止自己接触到自身的作为原因的真理,^②也就是它的驱力,这正是精神分析的目标:产生作为症状的主体,这些症状反过来允许与他者短暂分离,从而为主体身份认同的潜在重构提供了条件。因此,至少在20世纪的量子力学与热力学革命之前一直主导着现代科学的科学决定论,是建立在对作为原因的无意识加以排斥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建立在把不可能性从因果闭合关系网络排除出去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一回事。

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个观点,这就是主张科学话语排除了象征的阉割。在“排除”^③机制中被拒绝的是主人能指,即阉割的能指,它确保他者的象征有效性,从而为主体性提供支持。“当我谈到排除(verwerfung)时讨论的焦点是什么?它是对进入了外部阴影的原初能指的拒绝,对一个以后将在那个层面上消失的能指的拒绝。在这里你看到的是被我视为妄想症基础的基本机制。”^④拉康因此认为科学知识有助于精神病结构^⑤的形成。更确切地说,现代科学话语往往会建立一种妄想症类型的主体性,譬如那些基于可能遭受一个恶毒的他者入侵的感觉而建构的主体性,并得到它的支持。尽管对于拉康而言任何知识的获得本质上都与妄想症相关,因为知识是通过想象性地认同被压抑的他者而获得的,但他仍然认为现代科学话语强化了基本的妄想机制在形成认同过程中的作用。

科学的妄想症主体需要一个完全透明的、清晰可辨的、可计量的他者。也就是说,他想要消除他者令人不安的“他异性”,也就是由象征的阉割机制所建立的、构成其难解之谜的实质的否定性。否认了父亲之名(阉割的能指),妄想症患者坚信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他者。出于这个原因,他者身上所存在的任何

① “Ad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拉丁文,中世纪认识论格言。——译注

② 在《科学与真理》中,拉康提出:“要考察我们的科学所具有的惊人的生产力,必须将科学是自我维系的、它不想知任何作为原因的真理这一事实考虑进来。”参见 Jacques Lacan,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6, p.742.

③ Forclusion: 法语词,拉康用来翻译弗洛伊德术语 verwerfung,对应的英语词即 foreclosure。——译注

④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The Psychose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7, p.150.

⑤ 拉康根据主体的结构把精神疾病分为三种:神经症或癔症(neurosis)、精神病(psychosis)和倒错(perversion)。神经症是由于压抑(repression)而形成,精神病则是由于排除(forclusion)而形成,也就是说排除了象征界(符号界)的阉割,父亲之名是不在场的。精神病的发作就是本应发挥符号功能的父亲之作为大他者的欲望出现在真实界中。精神病有多种,包括妄想症、精神分裂、忧郁症、狂躁症等,拉康论述最多的是妄想症。——译注

可察觉的不足或不一致都将它变成被邪恶的享乐所充斥的实体,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折磨着妄想症患者。拉康的公式非常清楚:“就排除(Verwerfung)的意义而言,在象征秩序中被拒绝的任何东西都将在真实界中重新出现。”^①这就是压抑与排除的区别:说在压抑机制中,无意识的形成物回归到象征界中,也就是说,被压抑的内容仍存在于语言的意指链中,成为其中的一环;而在排除机制中,在象征阉割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回归者只可能出现在真实界。简单地说,在精神病结构中,主体完全暴露在他无法通过语言调解现实直接性(真实界)的无能当中。或者说,在精神病中,语言无法在无意识中下锚,结果无意识也就无法被吸纳并成为反被我们用来保护自己不受真实界伤害的他者的一部分。

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强烈希望进一步阐明拉康关于科学话语的精神病倾向的观点与我们关于资本主义话语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话语把自身安置于科学的知识中,目的是尝试恢复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神经症与倒错的结构。如果科学依据定义是通过缝合主体来运作,因而禁止阉割的能指进入并废除了主体—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充分假设(继承了)科学驱力的资本主义话语则不顾一切试图重建条件以恢复虚构的他异性,从而掩盖其自身特殊的、与价值的积累相关的死亡驱力。当他者丧失有效性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则调动新的心理资源努力回避真实界。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历史可被看作一种重复的努力,努力通过各种伪装性的辅助手段,包括了从宗教到伦理与意识形态的、一切有效认可新的价值化拜物教的伪装,来掩盖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动力。资本主义动力本身并没有改变,因为它体现了驱力的强迫性重复。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在现代,这种资本主义的伪装已经逐渐失效,尤其是当资本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时。今天,留给资本的已经不再是能掩盖其驱力的具有实质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它所能使用的唯一的捍卫机制可以说就是倒错了。

三、绝望时代的倒错手段

我们声称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是全面倒错的时代,如果用拉康的词汇来表达就是一个当代他者逐渐衰弱的情况下由特定的主体性否认策略所主导的时代。我们要强调以下这个历史悖论:倒错作为一种“自发的”精神上的妥协,目的在于应对由资本主义驱力的危机所引起的令人窒息的焦虑。资本主义的驱力已经越来越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The Psychose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7, p.13.

无法依赖价值形式的形而上学以及相关的幻想来维持。正如下文将阐明的,今天的经济危机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危机。它暴露自己的方式之一是科学的驱力与资本主义在认识论上结成“赤裸裸的”联盟然后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革命)为资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刺激,使它削减生产成本(可变资本,即人类劳动),同时不知不觉地削弱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其产生利润的能力——毕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只能通过(剥削)人类劳动来产生。因此我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同时发生的,是其自身的自我破坏潜能的增强,而且情况日益严重紧迫。自我破坏的潜能总被铭刻进资本主义驱力的真实界,在资本与科学技术直接结盟的今天这个真实界显然可见。今天一个荒谬的悖论是,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极速发展,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生产财富——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价值”——的能力急剧减弱。相应地,资本所赖以运作的象征叙事的衰落意味着倒错作为一种孤注一掷的防御机制已经全面展开了。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形。

如拉康所论述的,倒错的隐秘目的不是违反律法,而是使律法重获权威,乃至最终显得明确、坚定不移和坚不可摧,情况类似于受虐狂的例子,受虐狂与折磨他的严苛的、强硬的施虐者之间签订了盟约。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超自恋表现癖的各种表现在本质上都是倒错的,它们背叛了无意识的欲望而屈服于他者的凝视,带着确保他者获得完全满足这个秘密目的,制造出他者坚不可摧的幻象,从而保护了自我(“他们注视着我,因而我存在”)。把自己奉献给他者是被焦虑所困扰的主体为保证其自身的主体一致性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方式。我们只需想想“自拍”这种最近的大众流行现象就可以对今天的表现癖的作用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生活的媒介化滋养了今天的表现癖,它建基于这样一种幻象:我们可以用物理的他者(媒介的凝视)来替代逐渐过时的社会象征的他者(虚拟的凝视)。

紧随弗洛伊德的理论突破之后,拉康提出,倒错者的主要特征是成为他者获得快感的工具,以便建立或恢复他者的权威。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倒错会在危机时期盛行,譬如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殉道中(以其权威在历史上摇摆不定之上帝的名义);或者在后现代主体的行为中,他吹嘘与意识形态诱惑之间的犬儒式距离,把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生活作为牺牲奉献给上帝——资本的祭坛。齐泽克明确提出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倒错是原教旨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它们所依赖的是积极的知识而非信仰:“原教旨信徒并不相信,他直接就知道。自由怀疑论的犬儒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特征:就信仰一词的本义而言,他们都丧失了信仰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建立起每一个可靠信仰的都是毫无根据的决定,是并没有建立在推理和积极的知识基础上的

决定,这是无法想象的。”^①

简而言之,在价值化危机的重创之下,象征的有效性越发恶化,主体的反应就越发具有倒错的性质,他为了阻止它继续消耗不惜把自己当作他者的祭品。因此倒错与神经症不同,神经症患者努力抵御强大的、隐形的、威胁着要把其生吞活剥的律法的干涉,而倒错者则与一个脆弱的、显然无法为成功的主体认同提供充分保障的象征秩序达成协议。神经症患者可以利用能指的宝库,倒错者却不能,他必须主动介入他者的破裂,尝试从力比多的层面恢复他者的权威。换言之,倒错者是把他的力比多用作一个木塞、一个填充物或者一个应急物,目的是堵住被削弱的他者的裂缝。

如果说,在大学话语中对知识领域加以总体化的尝试因为倾向于产生精神病结构而遭遇其极限(这种主体性无法拦截以被排除的主人能指身份出现的话语的真理: $S1//\$$),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我们则见证了被缝合的主体成为一个“不具有无意识的”超自恋个性的虚拟增强效应。资本主义话语产生于主人话语第一对组合($S1/\$$)的倒置,它彻底改变了前面四种话语的逻辑,以期将它们本质上的无能转变为社会性的生产引擎。如果说主人话语产生了一个保持不变的无序的剩余,只有通过欲望与幻想才能接近它($\$ < a$),那么资本主义革命则建议对这个毫无意义的剩余进行价值化、生产和交换,将它变成普遍可获得的实体。

正如拉康在米兰大学的黑板上所列出来的,资本主义话语在它的四个概念之间重现一种循环的、符合逻辑并且看似不受打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实质上模拟了无穷的闭环(∞),这并非偶然。我们的乌托邦便存在于此,存在于这样的幻想中:幻想着创造一种永远加速的水平运动,真实界的价值化为它提供动力。他者的中立化过程启发了大学话语,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资本主义也从中萌芽,其目的是对真实界的系统性抽象化。它张大嘴巴,要求对过剩进行无尽的商品化,也就是对人类劳动的真实界的无限循环、价值化与鲸吞,拉康在整个第十七期研讨班中用“知一行”(savoir-faire),一种“无意识的有用知识”来描述这种情况。

如果资本主义话语想要避免阉割,它必须同时提供关于主体性实现的幻象。这就是为什么掌控了资本主义话语的主体,恰恰采取了作为工人—消费者身份的无意识歇斯底里主体($\$$)的形式。但是,这个分裂的主体所行使的结构性功能并不是像在歇斯底里话语中那样挑战主人能指所拥有的知识($\$ - S1$);相反地,主体随时乐意献身于他者的快感,占据了真理位置的资本主义驱力正体现了这种快感(这也正是从 $\$$ 到 $S1$ 的向下矢量的新颖之处)。换个方式说,资本主义的主体变成

^① Slavoj Žižek, “The Fundamental Perversion: Lacan, Dostoyevsky, Bouyeri”, in *Lacanian Ink*, 27(2006), pp.114 - 129, p.127.

一个引起快感的恋物,分担了提供给他唯一结构,那个由资本主义价值化所决定的结构。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证实这个结构的有效性,以便反过来获得一定程度的主体一致性。倒错正体现在:不是通过(弱化的)他者来运作,而是拼命想使他者自身运作起来。其策略包括设法建立一种建立在无限的循环利用行为基础上的社会本体论以避开象征的阉割:a(在主人话语中,它是意指活动的毫无意义的剩余,也因而成为欲望的客体—原因)转变/扭曲为一个普遍可数的、可交换的价值,它将永无止境地资本主义驱力提供滋养。

资本主义话语

$$\downarrow \frac{s}{s_1} \times \frac{s_2}{a} \downarrow$$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剩余价值,它作为资本主义驱力的目标,只有当其扮演起能够维持驱力的引力轨道的无形实质这个角色时才显得重要。换句话说,资本的加速运动取决于它对其形成原因即剩余价值的构成一无所知。拉康在1972年说过:资本主义话语跑得飞快,好像“装上了轮子”,但是,“它的自我消耗也近乎耗尽的程度”。^①为什么?因为以积累与自我扩张为目标的盲目加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它不理解触发这种加速的机制,即剥削劳动力的必要性。但是在资本主义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今天,日益遭到淘汰的正是劳动力本身。

四、绿色资本主义的创新悖论

转向倒错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偶然性的事件,而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增殖体制以指数方式增强的破坏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正以怪异的慢动作在我们眼前展开的生态经济灾难的特殊管理。其措施包括从对风险(“灵活性”)与成本(“紧缩”)的犬儒式社会化到通过日益高涨的“量化宽松”潮流使货币毁灭性地贬值,以及对“具有竞争性”而非可持续性的能源(“水力压裂技术”“洁净煤”)的竞相争夺。另一个相对不为人知但却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英国“放松管制法案”。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使对再管制的郑重承诺成为危机管理的修辞核心,但仅仅在6年半之后的

^① Jacques Lacan, *Lacan in Italia / Lacan en Italie 1953-1978*. Milan: La Salamandra, 1978, p.36,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ck W. Stone, web.missouri.edu/~stonej/Milan_Discourse2.pdf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6).

2015年3月,“放松管制法案”就开始施行。尽管该法案并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它构成名副其实的“法上之法”,使“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望”成为现行以及未来的法律和规章都要符合的最终标准。^①它想要根据对企业的净收益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来简化英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意图不仅与诸如 TTIP^② 与 CETA^③ 等“贸易协定”相一致,而且总体上更与欧盟的广受诟病的企业放松管制议程相一致。^④我们别忘了,这种危机管理同样包括向命运行贿的工作体制,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把这种体制强加给自己,并习惯性地相信为了保持或者恢复事物发展的有序进程,这种牺牲是必需的。但是,在以下三个强大的神话中,资本增殖经济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盲目性直接地暴露出来,这三种形式也可以说最有效地助长了这种盲目性的延续:

1. “1989年”的历史宏大叙事,它将苏东剧变解读为市场经济的胜利。
2. “创造性破坏”的奇谈怪论,根据其观点,只有在科学技术领域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
3. 无需工作之社会(end-of-work-society)的解放论话语,它将当代工作社会的崩溃呈现为一幅无需工作的后资本主义世界蓝图。

这些神话为我们屏蔽了对这个时代严重的生态经济困境的创伤性意识。它们都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有限性加以强烈否认并互相声援。这个否认通过无数种声音对我们发言,从“就让一切照旧”的政治(business-as-usual politics)到因为相信世界末日论而涌现的窥阴癖(apocalyptic voyeurism),同时又在新自由主义者对工作的神化和享乐主义者“不再工作”的歌斯底里症之间摇摆不定。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第二个神话,自从当前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它在公共政策辩论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首先,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论继续全面展开,但无论哪个阵营都没有忽视以下事实:在“紧缩”与“增长”之间的选择实际上是窒息与溺水之间的选择。人们越来越怀疑,当前的危机可能不仅仅是另一个熊彼得式的、为新的经济扩张奠定基础的“创造性破坏”事件。^⑤政策制定者们不愿意让财政与政府的

^① Deregulation Act 2015, section 108, 1,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5/20/contents/enacted/data.htm> (accessed: 19th September 2016).

^②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译注

^③ 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是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译注

^④ 详见:Linda Kaucher, “How TTIP fits perfectly with the Deregulation Act, which can overrule all other laws if they affect growth or corporate interest”, LowImpact.Org, 28th November 2015, <http://www.lowimpact.org/how-ttip-fits-perfectly-with-the-deregulation-act-which-can-overrule-all-other-laws-if-they-affect-growth-or-corporate-interests/> (accessed: 12th July 2016).

^⑤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42, p.71ff.

债务泡沫破灭,也就是不愿意“不良资产”的破坏自然发展为生产性投资与新的增长的前提,他们这种随处可见的不情愿不正是普遍预感的迹象,预示了“创造性破坏”终究时日不多,而“焦土政策”则可能成为21世纪经济危机更为恰当的隐喻吗?在这一系列变化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伦敦财政研究所(IFS)关于2016年英国生活水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研究报告。罗伯特·乔伊斯(Robert Joyce),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报告的作者之一,明确指出当前的经济发展是不正常的,尤其是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薪资长期缩水:这“不仅在国际上是不正常的,在英国历史上也是不正常的。实际工资减少并且不再恢复”。^①展望未来,自由派智库负责人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指出:“2021年的实际工资将仍然明显低于2008年的水平。实际收入超过10年时间没有增长:再怎么强调这个情况的可怕之处都不为过……在过去的70年里,我们确实没有见过一个与此类似的时期”,^②这个判断得到英格兰与威尔士工会联合会、^③英格兰银行^④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许多组织^⑤的广泛认同。

但是,当社会形态崩塌的时候,幻象却是取之不尽的。杰拉德·戴蒙德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像玛雅与维京格陵兰岛这样的历史社会是如何崩塌的。^⑥无论具体的轨迹与演变如何,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重要特征:一察觉到生存处境变得危险,它们就开始强化所有到当时为止看似成功的策略与实践。它们仍然继续基于过去的经验与实践理性来运作,然而它们的生存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同样地,今天,一方面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毁灭性后果同时打出了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牌,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新的科技运动将拯救我们,如英国重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威尔·赫顿就坚决认为:“当创新与好的资本主义重新结合时,西方经济将重新增长。”^⑦赫顿解释说:“正是伟大的通用技术(GPTs)——蒸汽机、飞机以及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经济。”“20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通用技术推动了经济复苏,而在20年代生产过剩之后进行了改革的资本主义则起

① Katie Allen and Larry Elliott, “UK joins Greece at bottom of wage growth league”, in *The Guardian*, 27th July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6/jul/27/uk-joins-greece-at-bottom-of-wage-growth-league> (accessed: 18th September 2016).

② FT, “UK facing ‘dreadful’ prospect of 10+ years without real wage growth — IFS”, in *Financial Times*, 24th November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f859e8-dfed-3ea5-a9e2-7bed527c8e6d> (accessed: 28th November 2016).

③ TUC, “UK workers experienced sharpest wage fall of any leading economy”, 2016, <https://www.tuc.org.uk/economic-issues/labour-market/uk-workers-experienced-sharpest-wage-fall-any-leading-economy-tuc> (accessed: 5th August 2016).

④ Mark Carney, “The Spectre of Monetarism”,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Speech, 5th December 2016,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speeches/2016/speech946.pdf> (accessed: 12th December 2016).

⑤ 参见: OEC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6*,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http://dx.doi.org/10.1787/empl-outlook-2016-en> (accessed: 14th September 2016).

⑥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rvive*, London: Penguin, 2006.

⑦ Will Hutton, “Mervyn King didn’t grasp the crisis then — and he doesn’t now”, in *The Observer*, 6 May 2012, p.34.

到协助的作用。经济要从今天这样无法遏制的低迷中复苏也将需要同样的魔力。”^①赫顿的观点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学家们^②以及政策顾问们的赞同。为了顺利解决上述“英国长期的低薪问题”困境,决议基金会智库的康纳·达西强烈主张,除了制定如全国最低工资这样的政策以帮助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们之外,英国还必须把生产率的强劲增长定为“政府的中心目标”。^③

如果说人们大都同意当前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常的低生产率经济的结果”,^④却几乎没有人能像尼古拉斯·斯特恩那么权威地把它写出来。^⑤斯特恩是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伦敦经济学院的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著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的、影响很大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port)。在《全球协议》中,斯特恩描绘了一幅关于“如何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创造一个增长与繁荣的新时代”的可实现的“蓝图”,^⑥这就是“绿色新政”。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他在一系列论文中分析了气候变化、世界贫困以及经济衰退之间的关联,对“绿色新政”进行深入详尽的阐述,他的新文集《我们为何还在等待?》是对这些观点的总结。^⑦斯特恩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与贫困的方式“将定义我们这一代人”,当下显然严重而漫长的经济衰退将仅仅构成历史上一个短期的危机,我们必须在应对21世纪这两个重大挑战的策略范围内将它克服。此外,当前的金融与经济困境“带来了关键的机遇与要求,我们要寻找一个能产生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引领我们摆脱危机”,因为“我们不想刚从上一轮的失败中走出来却又播下下一次泡沫的种子”。^⑧在全球性财政刺激的支持下,斯特恩坚持认为,新一代的绿色技术将带来“能够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的新增长模式,如在过去的年代里铁

① Will Hutton, “Britain’s future lies in a culture of open and vigorous innovation”, in *The Observer*, 14th October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oct/14/will-hutton-britain-innovation-hub> (accessed: 15th October 2012).

② 参见: Paul Krugman,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2013;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s: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 London, New York and Delhi: Anthem Press, 2014; Joseph Stiglitz, *The Great Divide*, London: Penguin, 2016.

③ Conor D’Arcy, “The National Living Wage will bring Britain’s need for stronger productivity growth into sharp focus”, 2016, <http://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media/blog/the-national-living-wage-will-bring-britains-need-for-stronger-productivity-growth-into-sharp-focus/> (accessed: 12th April 2016); Conor D’Arcy and Gerwyn Davies, *Weighing Up the Wage Floor: Employer Responses to the National Living Wage*, Policy Report of the CIPD and Resolutions Foundation, February 2016, <http://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6/02/7218-National-Living-Wage-report-WEB.pdf> (accessed: 20th April 2016).

④ Economists for R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The Cracks Begin to Show: A Review of the UK Economy in 2015*, by John Weeks, Ann Pettifor, Richard Murphy, Özlem Onaran, Jeremy Smith, Andrew Simms and Jo Michell, 2015, p.16, <http://www.primeconomics.org/articles/the-cracks-begin-to-show-a-review-of-the-uk-economy-in-2015> (accessed: 12 March 2016).

⑤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Nicholas Stern,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How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7.

⑦ Nicholas Stern, *Why Are We Waiting? The Logic, Urgency, and Promise of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2015.

⑧ Nicholas Stern,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How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9.

路、电力、汽车以及信息技术所做到的那样”。^① 假如“全球经济刺激的绿色成分”足够多,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既降低地球的风险又激起新技术浪潮的方式来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新的技术浪潮将创造出二十到三十年的强劲增长,以及一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安全、更清洁、更有吸引力的经济”。^②

当然,我们所选的段落突出了那些表明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广泛争论的内容,^③但是它们并没有充分体现斯特恩观点的复杂性。另外,面对诸如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伊恩·普利莫(Ian Plimer)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顽固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时,我们自然相当同意斯特恩所发出的急切呐喊:“气候的变化就在此时此地”,^④我们要果断地、一起行动起来,因为“减排的规模与避免气候变化的巨大风险紧密相关,它意味着一场新的能源工业革命”。^⑤但是,斯特恩设想新一代的绿色技术能像过去的铁路、电力、汽车以及信息技术那样带来改变社会的新的增长模式,这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低碳技术能够开辟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来源”,^⑥这是全世界具有“绿色思维”的政策制定者们所支持的信念,^⑦提出这种观点也许是令人振奋的,在政治上也是便利的,然而低碳技术却无法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的。与政治领域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期望^⑧相反,我们将设法解释为什么新的科技运动不能引领我们走出生态经济困境:(1)为什么它不提供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2)也不提供如绿色资

① Nicholas Stern,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How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9.

② Nicholas Stern,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How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9;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two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9, p.195, <http://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14/03/PPEconCrisisSternMarch09.pdf> (accessed: 6th September 2009); Nicholas Stern, *Why Are We Waiting? The Logic, Urgency, and Promise of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2015, p.xxvii, pp.33–88, pp.93–95.

③ 参见: Jonathon Porritt, *Capitalism as if the World Matters*,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John A Mathews, *Greening Capit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Nicholas Stern, “Climate change is here now and it could lead to global conflict”, in *The Guardian*, 14th February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4/feb/13/storms-floods-climate-change-upon-us-lord-stern> (accessed: 15th February 2014).

⑤ Nicholas Stern, *Why Are We Waiting? The Logic, Urgency, and Promise of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2015, p.33.

⑥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two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9, p.5, <http://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14/03/PPEconCrisisSternMarch09.pdf> (accessed: 6th September 2009).

⑦ 参见: Carlo C Jäger et. al. *A New Growth Path for Europe: Generating Prosperity and Jobs in the Low-Carbon Economy, Final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Potsdam; European Climate Forum, 2011; OECD, *Towards Green Growth: Tracking Progres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4437-en> (accessed: 13th March 2016).

⑧ 参见: Anatole Kaletsky, *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London: Bloomsbury, 2011;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London: Verso, 2015;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Future*, London: Penguin, 2015.

本主义倡导者所主张的“更安全的地球的蓝图”；^①(3) 为什么它无法彻底解决普遍的技术性失业与赤贫问题从而“使世界经济超越资本主义”。^②

虽然铁路交通、电力以及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的汽车在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增长与就业产生了极具活力的影响,然而这在历史上是不可复制的。数字革命开创了后工业时代,但它的影响根本不同。其前所未有的理性化潜能不仅仅是造成苏联集团经济崩溃的中心因素,而且成为一种技术驱动,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反对劳动阶层的全球性阶级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质上向假性增长的逃避等一系列变化,以上这一切在经济上把我们带到今天的境地。

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对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经济增长的起伏进行大规模分析,从不同角度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③戈登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增长,也就是超出资本与劳动增长的经济扩张作为他的主要绩效指标,这个指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每年低于 0.5%,20 世纪 40 年代上升到 3%以上,70 年代又下降至 1%以下,造成之后的增长态势减缓,由此证明自 1870 年至 1970 年间的基础创新对生产率增长、就业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是无法复制的。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好的资本主义”或“可持续增长”的本质与有效性,资本主义都无法恢复提供劳动密集型生产线与充分就业的技术基础建设。当社会再生产体制建立在其产品面向匿名市场的唯我主义企业以及对人力劳动的攫取基础上,那么一旦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脱身,无论是技术的盲目发展还是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失业与贫困)与经济后果(利润压缩与经济萎缩)都无法被阻止。随着每一次技术创新的到来,我们将继续毫无悔意地锯掉我们所坐的树枝。然而,问题又来了:难道这不正是那种嘲弄人类创造性与自由意志的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粗暴的不是对它的批评而是它的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的强迫性冲动全球化的世界,其中最隐匿、最阴险的冲动是人类想要把自己变成可供以出租的人类能源内燃机,一种只有被升华为道德高尚且志向高远的生活方式时人们才能够承受的命运。

① Nicholas Stern,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How to Manage Climate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9.

②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Future*, London: Penguin, 2015, p.265.

③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五、“大 否认”

人们相信技术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引领我们走出当前经济危机的驱动器,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个信念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呢?我们将着重指出这种合理性是以三个有问题的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前提是关于经济学就是资源稀缺情况下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假设,从萨缪尔森^①到克鲁格曼和威尔斯^②的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坚持这种主张。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当代经济形态中——如果它们确实是经济学主体的话——像商品和服务这样的实用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只不过是创造交换价值(货币)与货币利润的附带现象。

这就把我们引向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错误观点,也就是认为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及其所附带的一切幻象——例如自由、选择以及平等机会等^③——当中。事实上,“市场”是资本增殖经济中尽管关键但却短暂的一章。在剥削雇佣劳动时攫取的剩余价值必须转化为货币利润并再投资,市场为此提供了场所,市场经济也只是这样的—一个阶段。虽然市场经济的概念给人以历史永恒(循环、永恒轮回)的幻想,但是资本的增殖却是一个不会自我“重复”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资本增殖的结构性危机只不过表面上是对一成不变的问题的表现(明斯基时刻、^④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市场调节)。虽然在历史上它们很有可能间歇地、暂时性地将以往的过错一笔勾销,但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得到,这样做反过来又每一次都从根本上、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资本增殖的历史条件。

第三,相信新一轮的科技攻势可以像过去其他的通用技术那样对就业与经济增长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这个信念是把企业成功的驱动与宏观经济繁荣的驱动混为一谈。的确,从企业的角度看,技术创新与理性化是盈利与经济扩张的驱动器。但是,从资本增殖经济整体的角度看,情况并非一定如此。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剩余价值是一个社会范畴,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个别企业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与它们生产汽车、计算机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并不一样。个别企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它们所生产的任何一个商品的可以被证实的属性,而是

① Paul Samuelson, *Economics*,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p.3, p.18.

② Paul Krugman and Robin Wells, *Econom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13, p.6.

③ Nicholas Stern, *Why Are We Waiting? The Logic, Urgency, and Promise of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2015, pp.95-105.

④ “Minsky Moment”,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时刻,指过量借贷的投资者为了清偿贷款被迫出售优良资产,这个时候就是经济繁荣和崩溃的转折点,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译注

与其他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集中起来,构成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社会总体剩余价值。个别商品表征了社会总体剩余价值的幽灵般的、社会象征的物质性。但是,个别企业能获得多少剩余价值取决于它在市场上的竞争性,这反过来反映了其降低劳动成本——即消除人类劳动从而消除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的技术能力,同时迫使其他企业跟着这样做。那么,悖谬的是,最成功地发扬了创新精神的企业就是那些最大限度地削减社会总体剩余价值,因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削弱就业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般基础的企业。

鉴于我们今天的处境,新一轮的科技攻势只会在短时间内产生理想的结果,而且只对一些地区有用,在其他地区则会直接或间接失效。那些想要通过经济的力量(共同市场与货币区)与经济外的暴力(全球统治与战争)提高技术竞争力的国家与地区将控制仅剩的繁荣岛屿。现在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为什么斯特恩的号召会令很多人后背脊发凉了,他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必须做出表率,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证明低碳增长不只可行而且是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有益、高效并且具有吸引力的方法”,“它的确是唯一的可持续发展的路线”。^①只要能找到的工作与需要完成的工作之间的豁口继续变大,绿色新政就注定失败。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了以国家为中心以及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增殖经济综合体的终结,那么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斯瓦布所极力倡导的、^②由人工通用智能技术驱动的、飞速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否最终带来超越资本主义的协同经济体制?答案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认为是生产力不可遏制的历史发展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成为一种能够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体制的命运,我们也不会宣扬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技术乌托邦往往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某个自然的或技术上中立的过程。反之,生产力发展的特点、程度以及方向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身的社会病态形式所决定的。这里包含两层重要的含义:首先,在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在技术上得到发展的一切最终都将得到发展这种决定论信念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其次,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诸如“由极端生产力驱动的……物联网”^③等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在明智的政治框架、根茎模式网络以及社会生活全面民主

^①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two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9, p.8, <http://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14/03/PPEconCrisisSternMarch09.pdf> (accessed: 6th September 2009).

^② 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logne/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③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文名称为 Internet of Things (IoT)。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但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译注

化^①的支持下,会半自动地开创“协同共享以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主导模式”^②。在对今天的技术转变做充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描述时,^③杰里米·里夫金没有考虑到作为现代社会形构矩阵与发展驱力的抽象财富正在以自我指涉的方式进行扩张。虽然我们没有理由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也把孩子倒掉,也无须因此推动技术恐惧症的议题,但仍有必要指出,在现在的状况下,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价值形式就像套在它们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即使第四次“工业”人工智能(AI)革命对它们进行重新格式化,它们依旧无能为力,只能加速瓦解,进入抽象劳动的后资本主义军阀制度。

尽管存在相异与不可调和之处,上述规划与斯特恩的更安全的地球的蓝图之间仍存在共同点,它们都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拥有永恒地自我更新的神奇能力,除非遇到不可逾越的外部极限,比如地球的生态有限性,或者被反对与推翻。不管存在什么猜测与疑惑,他们都坚信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在《资本主义4.0》中所优雅地表达的,当前的危机只是“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足够明智,它迟早会促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生。^④这种意想不到的联盟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对一个毫无症状的普遍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想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拉康式观点: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在结构上存在重叠,这两种话语的目标都是妄想排除任何一种社会本体论内固有的实质否定性。这个未被阉割的乌托邦正迅速转变为那些无法与自身的形成原因建立联系的社会星座(社会系统或组织)的集体梦魇。

与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倒错设想不同,我们提出关于当前危机的另一种观点,归纳如下:

1. 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制度,资本主义不仅已经陷入自二战以来最深重的危机,而且已经抵达其内在的发展极限,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2. 它的失败并不取决于外部的“增长极限”,譬如对地球环境安全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的灾难性破坏,或者,如诸多政治派别所普遍认为的,是一种足以推翻它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它的衰落也绝不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3.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崩溃是它自身内在动力不可逆转的结

① 参见: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Future*, London: Penguin, 2015; Robert McChesney and John Nichols, *People Get Ready: The Fight Against a Jobless Economy and a Citizenless Democracy*,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6.

② 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6.

③ Jeremy Rifk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④ Anatole Kaletsky, *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London: Bloomsbury, 2011.

果。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丧失了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资本增殖经济的命脉与终极目标——的能力。

4. 结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陷入生产力持久低下的困境(“欠发达”),而过剩的人力则注定要在生存中被淹没(“失业”)。

5. 尽管如此,当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再基于人类劳动的价值化时,通过享乐主义者的“无需工作”的乌托邦取代资本主义是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的。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后现代或者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也不仅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即基于私有制、阶级统治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体系所造成的特有的过度积累与资本剩余吸收的问题。相反,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现代社会的生成矩阵本身的全面危机。

资本主义无疑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剩余吸收”的问题,即以货币利润的形式产生的剩余无法被资本增殖经济有效地吸收。这是一个真正的、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困境,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讨论过这个情况,^①但是它并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关键问题。对过去半个世纪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剩余的吸收问题,而是不可逆转的剩余价值的创造问题,它是我们今天所陷入的历史困境的最根本原因。

20 世纪很多经典批判理论都无法摆脱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资本主义创造了富裕的社会,因为它能够永远革新生产力。的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西方,似乎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们将不仅面对“过多”一词的非人性化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将面对缺少剩余价值的致命后果,也就是说资本增殖经济无法再生产维持社会生活基本坐标所需的生产力与社会制度。

今天,我们必须摒弃资本主义能够创造财富的迷信。这种错误观念将二战之后有限几个国家的发展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混为一谈。虽然资本在相当长时间内将继续积累,但随着新形式的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并且作为产生利润的“金融工具”受到热切的欢迎,它将进一步遭受缺乏价值增殖(通过从人类劳动中攫取剩余价值使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折磨。新的剩余价值的短缺最终将破坏资本的积累,直至整个社会再生产在各个层面上——地方的、国家的与全球的——都变成实际上不可能(“无法负担”)之事。社会“不发展便玩完”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如何终结。

虽然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经济在 20 世纪的世俗金融化(secular

^① 参见:Heiko Feldner and Fabio Vighi,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5.

financialisation)以及伴随而来的货币的贬值,但他所提出的“虚拟资本”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今天所发生的事实:不具有价值实质的资本的积累定义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也决定了目前为止所寻求的补救办法的性质。我们对倒错的精神分析抓住了迷惑金融化时代的拜物幻想的要害,即资本可以脱离剥削雇佣劳动的“麻烦”或者说“丑行”而实现价值增殖,换句话说,资本可以超越劳动而存在。钱生钱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梦中景象。不用说,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则是其不可能性的实际证明。

但是,如果事实是虚拟资本已经必然地并且不可逆转地、而非暂时或偶然地主宰了资本增殖的过程,而且资本积累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变成虚拟的(虚拟绝非是“想象的”,而是无实质的),为什么我们还会希望继续把对货币利润的经济攫取作为我们所认为的“有效”、“现实”以及“负担得起”的标准?对财政负担能力、经济效益以及财政现实主义等观念的质疑远远不止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它是超越单纯的危机管理逻辑的前提条件。后者使我们陷于倒错的情境中不能自拔,而在倒错情境中,最大的可能是死于富足之中。

(译者简介:许娇娜,1980年生,女,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黄漫,1980年生,女,广东潮州人,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

(本文编辑:王真)

20th Anniversary
1997—2017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College of Media & International Culture, ZJUI
and **Volume 20 | Issue 2**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t Aesthetics, ZJUI
Editor-in-Chief Wang Jie

Honorary Editor-in-Chief	Liu Gangji
Editor-in-Chief	Wang Jie
Deputy Editor-in-Chief	Xia Jinqian
	Feng Zhongping
Editorial Office Director	Yin Qinghong
Deputy Editorial Office Director	Yu Qi
	Wang Zhen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Editorial Board

(Alphabetized by last names)

Bennett, Tony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Dirlik, Arif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Duan Jifa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agleton, Terr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Erjavec, Aleš	Slove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Feng Xiang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Gao Jian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 Yam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 Zhiyi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Jameson, Fredric	Duke University, USA
Kristeva, Julia	L' Université de Paris Diderot, France
Lin Baoq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iu Gangji	Wuhan University, Chin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Lü Tonglin	University of Montreal, Canada
O' Connor, Justin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Petrov, Alexander V.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Russia
Qiu Gep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anders, Michael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Wang Jie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Wang 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Germany
Xu Dai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Zhang J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ang Zhengw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u Liyua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Žižek, Slavoj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